智库理论与实践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第 1 卷 第 2 期 2016 年 4 月

理论研究

中国智库古今延承之路：历史溯源与未来启示

■ 王文 李振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北京 100872

摘要：[目的 / 意义] 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发展步伐明显加快，逐渐呈现产业化的趋势，然而，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借鉴古代传统智库的经验，推动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方法 / 过程] 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传统智囊进行考察，剖析古代传统智库制度演变，得出了对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几点启示。[结果 / 结论]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政府应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库，善用退休高官打造中国式“旋转门”，致力于“伐谋”能力的提升，让更多外国精英参与中国智库建设，同时，中国也须有更多优秀的智库学者。

关键词：中国智库 智囊 历史溯源 启示
分类号：C932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6.02.02

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中国“智库热”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决策透明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力需要更多智力支持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没有“智库”或“思想库”（Think Tank）的说法，但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国决策者有重视智者和谋士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智库”或者“思想库”特点的组织团体、制度安排也不断涌现。此前，有学者对中国智库的历史渊源进行了初步阐述，本文更为系统地对中国历史上传统智囊进行考察，剖析传统智库制度演变，最后得出了对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几点启示。

1 古代传统智囊的历史考察

智囊，亦称为“谋士”“智士”“策士”“计臣”“门客”“幕僚”“幕友”“师爷”“权变之士”等，特指富有谋略、专门出谋划策的人。智囊一词在古籍中早有记载，例如，战国时秦国的樗里子、西汉时的晁错、三国时期曹魏的桓范均被当世或后人称为“智囊”。《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言：“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引用的干宝《晋书》也有“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的记载。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这些著述都说明了智囊的内在含义和特点，即“以智辅政、以智启民”[1]。

在中国历朝历代，贤明的帝王身边总是站着名扬后世的智囊谋士，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变革之时，统治者们更加重视发挥智囊的作用。这些辅佐君王、匡时济世之贤才，活跃在社会变革、军事斗争乃至政权更迭之中，为维护帝国统治、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曾如此评价：“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得士则昌，失士则亡”（《孔丛子·居卫》）。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优秀智囊的此起彼伏、代际相传，是中华民族能够

* 本文系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课题“智库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编号：15WWJB0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文（ORCID: 0000-0003-2053-6235），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E-mail: wangwen2013@ruc.edu.cn；李振（ORCID: 0000-0002-0932-041X），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E-mail: lizhen2013@ruc.edu.cn。

王文，李振. 中国智库古今延承之路：历史溯源与未来启示[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1(2)：8-13，26.

长期抵御外敌入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数次高度评价智囊：“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伍子胥列传》）。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和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加强，“作为决策者‘外脑’的智囊集团以不可阻遏的势头，日益发展和兴盛起来”[2]，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君主选择辅助自己治理国家的智囊也是有标准的。《曾子》有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师者，“学无前后，达者为师”，意指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友者，物以类聚，能力相当；徒者，从师学艺，能力弱于师。统治者们往往选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强的智囊。例如，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遂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类特殊的“智囊”，他们几乎很少依附于或从属于任何组织机构，而是以个人形式，或坚持“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宗旨，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墨子等人，他们以宣传自身的政治社会理想或主张为目的，想让决策者依据自己的理念进行决策；或秉承“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刘向《战国策•秦策一》）的信念，“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刘勰《文心雕龙》），参与或者影响决策者的重大决策。最知名的莫过于各个时代的纵横家，比如，战国的苏秦、张仪、公孙衍、鲁仲连，秦汉之交的蒯通，清末民初的王闿运、杨度。据《孟子•滕文公》的记载，孟子的弟子景春就曾感叹：“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除了古代君王决策者广泛招募智囊人物组建智囊集团外，许多担负重大任务的政府要员也试图组建幕僚团。清人黄潜有言：“古人凡当一方面者，无不妙选幕僚，其作用有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人，资其见识以救匡疏失，丰其俸养，勿使去而为患。即论历代开府用人，其意义何莫非如是。”（《花随人圣庵摭忆》）在治世兴邦之际，智囊辅佐主官提供参谋咨询，弥补了主官治理经验和个人才干的不足；在乱世危难之时，智囊发挥出谋划策、匡时济世的作用，成为危难之后治理国家的官员重要来源。典型例子如战国“四公子”的门客和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幕府。

中国古代智囊凭借自身才干，在群雄争霸、政权更迭、稳定时局、变法改革之时，为少数统治者以及各级决策者出谋划策，以实现治国安邦、强兵富民的目的。然而，传统智囊有其时代局限性，要依附于帝王或延请自己的朝廷要员。古人尤其是读书人、士大夫都有着“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观念，这也导致古代智囊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具有较少的独立性。同时，汇聚在统治者周围的智囊，往往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智囊团，只是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推理提供建议，而且影响决策的能力也受到专制制度、决策者素质、个人素质以及与决策者关系的制约。此外，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较为局限，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军事领域。

2 古代传统智库的制度演变

随着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以及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夏商家臣、两周命士、春秋战国门客、三国谋臣策士、两晋清谈名士、明清师爷与幕友，依次登上历史舞台。除了决策者非正式地、自发地网罗门客、幕僚、师爷、谋士、策士等来为自己的决策提供帮助之外，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些国家专门设置的智囊机构或制度。

2.1 先秦“尊老制度”是古代智库雏形的起点

先秦时期，古代统治者将尊老养老纳入礼仪制度之中，设三老五更之位，帝王以父兄之礼养之，成为中国古代智库形态的雏形。《荀子•赋篇》言：“养老长幼，持之而后存。”老人的智慧能否应用于治理国家，事关国家存亡。所以，“尊

老养老应是国家统治者的重要国策”[3]。早在虞舜时期[4]，中国已经出现比较完备的尊老养老制度，睿智有经验的退休官员安排在学宫，为君主提供建议或教育学生。《礼记·王制》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庠、序、学、胶均为学宫名，老人在颐养天年的同时，利用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教育培养年青一代，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由此观之，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的尊老养老的礼仪制度，已经出现了智库的某些特点。

此后，秦置乡三老，“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增置县三老。《汉书·高帝纪上》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三老为民师左右乡党舆论，也掌教化宣传国家法令礼法，已经具备现代智库制度的基本特点。

2.2 春秋战国“养士制度”孕育最早的古代智库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群雄纷争，各国混战不休。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各诸侯国先后变法，以求富国强兵、雄霸中原。各国诸侯纷纷招贤纳士，聘养食客，“春秋年间有所谓‘士’的一种阶层出现”[5]，大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战国以后，以纵横家为代表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春秋末战国初，养士制度风靡一时，养士的数量大大增加。”[6]“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史记·吕不韦传》)。战国“四君子”都以“养士”名显于世，各有门客数千人。这些怀才之士挟术怀策而奔走四方，“连横合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智库机构。出于富国强兵、巩固统治的实际政治需要，“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绵延一百五十余年。稷下学宫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将学术与政治分开，二是允许不同学派各自立说，互不相妨”[7]。稷下先生探讨治国安邦之道，“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荀列传》)。因此，稷下学宫既是学术研究机构，又是政治顾问团体，可以看成是有资料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决策咨询机构之一。

2.3 秦以降“谏议制度”是古代智库的典型代表

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统一封建王朝，形成了三公九卿为代表的封建中央官制体系，自此“命官之权悉操于上”[8]。

为匡正君主，谏诤得失，秦朝初置谏议大夫，负谏议之责，标志着谏议制度得以形成。汉承秦制，谏议制度得以传承。秦汉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实际上是君主的高级智囊，负有谏止或规劝之责。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和加强，谏议制度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备。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朝设门下省，负责谏议诸事，驳正违失，与尚书省、中书省并称为“三省”。唐宋时期，职官设置日趋完备，谏官职权日渐提高。隋唐仍设三省制，门下省有“封驳”之权，即君主下达诏令有误，可退还皇帝，请另颁诏令。宋代专设独立的谏议机构“谏院”，可匡正时弊，弹劾百官。随着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元明清三朝谏议制度逐渐衰落。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重要安排，谏议制度“在本质上体现了民主决策的部分特性”[9]。

秦汉时期，为应对复杂的社会局势，加强对国家的直接控制，具备某些“国家智库”功能的博士议政制度出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续汉志》也记载：“博士，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唐朝时期，谏官制度开始形成并完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道：“群臣有待问之时，谏官有请对之时。”自唐朝延续至明清的翰林院是古代具有“智库”性质的典型代表机构。翰林院由皇帝御用的文书智囊团队演化而成，依附于皇权，自成一家，独立于其他中央机构以外，具有“智囊团”“参谋部”“储才院”功能，“掌内制”“备顾问”“献纳论思”“掌文翰之事”。[10] 值得注意的是，“谏

王文，李振. 中国智库古今延承之路：历史溯源与未来启示 [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1(2)：8-13，26.

议制度本质上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11]。

2.4 明清“幕府制度”成为古代智库发展的顶峰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皇帝总揽军政大权，钦宸独断。中央政权得到空前巩固，职官制度也更加完备，官僚均由朝廷任命，都是朝廷命官，从官制而言已经没有幕职的性质。传统的幕府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由于明清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幕主私人设置的幕府成为地方不可或缺的辅佐机构。明清时期，选拔官吏沿用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削弱了官员对国计民生的了解，治国理政能力明显不足。由于地方官僚制度不完善，编制稀少、诸政负责，各级长官难以事事躬亲。“夫督抚司道郡县，即有杰出之材，不能不待助于襄赞之人，故幕宾之不可无者，势也”（《澄怀园文存》）。因此，设置幕府、延请幕友（俗称“师爷”），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迫在眉睫的。随着明朝督抚发展成为地方长官，明清幕府兴起，直至辟幕成风。“上自督抚，下至州县，凡官署皆有此席”[12]，以至当时有“无幕不成衙”[13]的说法。由此可见清朝幕府的规模之庞大、发展之鼎盛。

与传统幕府制度相比，明清幕府制度有属于自身的特点，在清朝恢复了隋唐之远的辟幕之风，完成了幕僚制与正官制的分离，实现了幕僚的专业化，“开始走向职业化”[14]。入幕者不拘于功名德行出身，非官非吏，协助幕主处理具体琐碎的政务公事。幕友与幕主是平等的私人雇佣关系，“常处于师友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15]。正如张纯明所言：“元明以后幕职和以前迥然不同。法定的佐治人员形同虚设，位卑禄微，不足轻重，人以杂流目之。地方官吏办事不能无人，法定的人员既然不中用，只好在法定以外谋补救的办法。”[16]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幕府也超越了传统幕府”[17]，随着清王朝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晚清幕府实现了对传统幕府的回归，幕府规模大，幕僚拥有正式职衔，地位高，权力大。同时，晚清幕府呈现出许多独特特点：史无前例的事权扩张，前所未有的洋务外交运动，以及无法想象的以幕主为中心的派系割据之祸。

此外，民国时期，幕府制度“非但没有遭到根除，反而与时俱进，仍然活跃在民国政坛上”[18]，不过是以现代行政机构的面孔出现，但仍然没有改变为一人（幕主）效劳的本质。孙中山为保护革命果实，无奈采用幕府制度；袁世凯为实现个人独裁统治，实施霸府政治，“当选”中华帝国皇帝；蒋介石充实完善侍从室，独揽党政军大权，建立了专制独裁的蒋家王朝。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国幕制迅速消亡，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3 古代智库对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逐渐呈现了产业化的趋势：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有充足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这些积极迹象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智库建设还存在诸多不足。不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智库的经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3.1 政府应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库

政府相关部门应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库，激发智库为党和国家建设服务的最大潜能，让智库真正发挥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中国古代决策咨询机构都内在地要求决策者善用、善管和善待他们，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出决策影响力。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加快，政府的治理也需要与时俱进善用智库，就是要学会用十个指头弹琴，推进智库为政府承担决策咨询，包括决策出台前的调研、谋划、测试等大部分工作，对决策效果的评估、解释与反馈等工作。在对外公共外交、结交国际朋友、获取国际智慧等各方面，智库也应有所作为。另外，智库还应为政府培养高等人才和政治精英。

新型智库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却也暴露了“智库”概念泛化、大跃进等不良趋向。政府作为社会团体的最终管理者需要未雨绸缪，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净化智库行业，更好地使智库为政策决策制定发挥积极作用。建议筹建类似“中国智库联合会”的行业组织，通过行业联合的方式规范标准与流程。

3.2 善用退休高官打造中国式“旋转门”

近年来，中国一些退休高官开始加入智库，为

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建策建言。比如，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建立了首家超大型民间智库“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建立了首家高校公共外交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等等。然而，在中国，如何善用退休干部，仍然是值得摸索的复杂课题。一方面，大量退休干部年富力强，完全有能力和实力为国家和社会继续发挥余热；另一方面，如何将退休干部吸纳进智库的专业知识生产轨道中，高度考验着中国智库的能力。

事实上，智库如何善用前高官的问题本质，不仅在于官员退休后的去向，而且在于智库本身需要有大量熟悉决策进程的研究者和运营者。从长远看，新型智库的建设需要打造中国式“旋转门”，需要不拘一格地在智库平台上培养与运用人才。智库可定期选派一些学者到各级政府挂职锻炼，政府也可选拔一些官员重回各类智库锻造。长期下来，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将大大加强，学有所用的智库学者与有思想底蕴的官员将大量应运而生。在中国式“旋转门”的基础上，智库就能够和善于运用退休且仍精力充沛的老干部。在目前的退休人事机制中，中国完全能实现类似于先秦的尊老养老制度，让睿智有经验的退休官员发挥余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拥有政府关系、品牌打造、报告质量、写作水平等多种能力与经验，需要构建老、中、青综合型的人才队伍，以及一整套激励、淘汰、考核、规划、管理等内部机制[19]。

3.3 中国智库要致力于“伐谋”能力的提升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里讲到的“伐谋”（意即以谋略取胜），正是智库常被人忽视的功能。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中国古代智囊，服务于君主的国家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影响他国政策，战国时期各大国“连横合纵”就是其中的例子。

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须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抢夺国际话语权，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将智库建设纳入到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从智库的国际交往看，应当转变“外交无小事”的固有认识，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智库就各个“小事”灵活进行国际交流，建立中国整个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沟通机制。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可以利用中国智库培训国外官员等方式，实施与推广国家外交大战略，广交国际朋友。建议新型智库加强与欧美著名高校、机构合作，设立欧美分部，在思想领域上广泛与当地交流，同时，主导欧美智库界对华研究议程，购买当地最上乘、最有助于中国发展的思想产品，并向当地推广本国的理念与思想[20]。

3.4 让更多外国精英参与中国智库建设

中国智库运用外国人力资源尤其是外国精英还不普遍，在大多数智库中几乎找不到全职外籍雇员。春秋战国养士制度，天下诸侯竞招各列国英雄为己用，稷下学宫也汇聚各国贤才。目前，中国智库吸纳外国精英参与尚存障碍。一是观念障碍。中国智库人士一向认为，智库工作与决策进程密切相关，工作过于敏感，有外国人的参与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外国人可能存在着国家忠诚度的问题。二是外籍人口管理制度的障碍。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各类体制议题限制，要引进一位外国知识精英，通常要经历很长的考察与办理程序，有的程序甚至是不可跨越的。三是人事聘用制度的障碍。中国研究机构长期习惯于编制内管理的传统框架，对管理外国研究人员没有足够的经验。四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从目前欧美舆论对华并不友好的事实看，不少外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智库还怀有不同程度上的偏见。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进一步改革外国精英的智库参与机制。兼听则明，无论国外知识精英给予中国决策进程怎样的建议，多听一些看法总是好的。从国家层面看，需要有包容国际人才的胸襟与胆识，在国籍开放、签证办理等多方面，给予外国知识精英必要的包容与平等政策。从智库管理看，需要有更多制度创新与理念开放。

只要在实事求是、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制定内部管理制度，中国智库完全有能力用好更多的外国知识精英。从国际互动看，需要有更多跨国互动与双边合作。知识碰撞与思想交流往往能出现更多的火花，通过频繁的国际交流与坦诚的相互沟通，中国智库才能赢得更多国际认可，进而塑造更强的国家吸引力 [21]。

3.5 中国须有更多优秀的智库学者

“智库学者”不能拘泥于纯理论和单一学术化的研究，而必须要有更强的现实问题导向和多元知识背景，研究内容往往随着现实需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正因如此，目前中国极度缺少优秀的、复合型的智库学者，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大障碍。优秀的智库学者需要有出众的综合能力，必须是全能选手，而不一定是单项冠军。从明清幕府制度来看，八股取士削弱了官员对社会经济的了解，难以胜任治国理政的复杂任务；而那些优秀的幕友，可能没有考取功名，却能把地方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因此，对大学培养机构而言，要因材施教，寻找一些好苗子，更多地引导和鼓励他们的智库志向。尤其是高校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不妨多鼓励自己的学生在完成学术任务的同时，参与各类与现实相关的实践活动，创造一些现实感强、政策性强的课题研究机会。对于智库而言，不必把人才招聘只限于学术圈，更不必把博士学位、发表学术文章设为智库学者入职的“硬杠杠”，而应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寻找智库人才。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智库的人才准入机制亟需变革。对于官方而言，不妨致力于打造一种智库文化。一些决策部门的官员能够牵头举办更多的研讨会、沙龙，最大范围内邀请智库学者参加，引导学术界、智库界的研究议程，倾听智库学者的建议，并与智库学者进行更多的互动与交流。渐渐地，一些优秀的智库学者就会脱颖而出 [22]。

参考文献：

[1] 李凌．中国古代的智囊制度 [J]. 决策探索 (下半月), 2016(03): 81.

[2] 卢明明 , 刘春萍 , 徐元宙 , 等．对中国传统智囊的历史考察 [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 1986(02): 139-147.

[3] 李玉洁．“三老五更”与先秦时期的养老制度 [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44(5): 21-24.

[4] 毕天璋．“用师者王”——中国古代智囊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23(4): 65-69.

[5] 郭沫若．十批判书 [M].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7: 45.

[6] 冯之浚．古今智囊 [J]. 民主 , 1998(03): 22-24.

[7] 张岱年．稷下学宫的历史意义 [J]. 管子学刊 , 1994(1): 24-25.

[8] 李晚成．中国幕僚制度考论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 1988(1): 85-92.

[9] 晁中辰．中国古代谏议思想与谏议制度刍议 [J]. 东岳论丛 , 2010, 3(9): 63-67.

[10] 王一鹏．翰林院演变初探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 1993(6): 62-69.

[11] 薄振峰 , 杨兴定．唐代谏议制度的性质及其启示 [J]. 理论学刊 , 2003(1): 133-135.

[12] 徐珂．清稗类钞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4: 1381.

[13] 黎仁凯．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 [J]. 河北学刊 , 2004(3): 176-180.

[14] 王佳宁 , 张晓月．智库的起源、历程及趋势 [J], 重庆社会科学 , 2012(10): 102-109.

[15] 周静 , 卢敦基．中国智库 : 历史渊源与当代发展 [J]. 浙江社会科学 , 2014(7): 84-89.

[16] 张纯明．清代的幕制 [J]. 岭南学报 , 1949, 9(2): 29-50.

[17] 李志茗．离异与回归——中国幕府制度的嬗变 [J]. 史林 , 2008(5): 14-25.

[18] 李志茗．传统与现代之间 : 晚清幕府制度之演进 [J]. 学术月刊 , 2008, 40(09): 140-146.

[19] 王文．善用退休高官打造中国式“旋转门”[J]. 对外传播 , 2014(6): 37-38.

[20] 王文．“伐谋”, 智库必须有的对外功能 [J]. 对外传播 , 2014(9): 36-37.

[21] 王文．让更多外国精英参与中国智库建设 [J]. 对外传播 , 2014(4): 41-42.

[22] 王文．中国须有更多优秀的智库学者 [J]. 对外传播 , 2014(8): 30-31.

作者贡献说明：

王文：研究选题、框架设计与论文撰写；

李振：资料收集与论文撰写。

(下转第 26 页)

Study on the Attributes and Uniqueness of the Products of Think Tanks

Guo Bao Zhuo Xiangzhi
School of Management,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basic problem, that is, what is the attributes of the products of think tanks to better develop think tanks and the think tank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attributes of the products of think tan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inner nature and outer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is paper studied their inner nature, and secondly, based on their inner nature, this paper studied their outer characteristics by comparison with common commodities.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ts of think tanks have five fundamental inner natures of scientificity, sociality, wisdom, externality, policy. It also implies that the outer market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s of think tanks have the general commodities and intellectual products characteristic an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determined by these five fundamental natures. The attribut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s of think tank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ttribut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show that on one hand, think tank organizations should improve the outer market operation mechanism, the inner product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the mechanism of learning, communication,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offer high-quality products of think tanks;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open, regulate the think tank market, and build up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the quality and efficacy of the products of think tanks in order to gain better effect of building think tanks.

Keywords: think tanks products of think tanks attributes of think tanks uniqueness of think tanks

收稿日期：2015-10-16 修回日期：2015-12-25 本文责任编辑：吕青

（上接第 13 页）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hink Tanks: History and Future

Wang Wen Li Zhen
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t present,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greater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show the tendency of industrialization during the best tim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raditional think tanks in ancient Chin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Through studying the great thinkers in ancient China, analyzing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ancient think tanks, we put forward some advi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ult/conclu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good at using, managing and respecting think tanks. Think tanks should make the best use of retired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create a Chinese-style "revolving door" and promote the capability of defeating the enemy by strategie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low more foreigners to participate in building Chinese think tanks and cultivate more talents to build Chinese think tanks.

Keywords: Chinese think tanks think tanks history enlightenment

收稿日期：2016-04-22 修回日期：2016-04-25 本文责任编辑：吕青